

# 谈恐怖主义

她采访了大约75名恐怖分子，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一个主任和根据她的作品拍摄的一部好莱坞核恐怖片的顾问。

## Jessica Stern与《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谈恐怖主义

**问：核恐怖主义——来自所谓的“脏弹”乃至掌握在恐怖分子手中的核武器的风险——是多大的威胁？**

核恐怖主义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恐怖分子集团一直在寻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恐怖分子利用核材料及其他放射性物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可以从核国家获取核武器；他们可以获取必要的易裂变材料自己生产武器，制造简易的核装置；他们可以攻击核电厂；他们也可以制造辐射散布装置，即所谓的“脏弹”。第一种可能性将是最具毁灭性的，但是或许也是可能性最小的。偷窃原子弹将是困难的，因为储藏核武器的设施一般都是受到严密保卫的。而把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的国家必须慎重考虑炸弹来源可能被查出和该国因此可能会受到报复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披露恐怖分子集团2001年曾在俄罗斯的核武器储存场所进行侦察任务的事曾让人担心，但是恐怖分子的勾当很快就被保安人员知道。

第二种可能性——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可用材料——是必须非常认真加以考虑的危险，特别是考虑到有关巴基斯坦核科学家和基地组织会晤的披露和有关阿卜杜勒·卡迪尔·汗网络运作的出口核技术秘密工作的暴露。恐怖分子通过攻击核电厂散布放射性材料

或者用自制的装置散布那些材料，是最可能出现的情景。重要的仍然是对威胁保持正确的看法。脏弹会造成比致死更为严重的恐慌。

美国政府曾经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放射性武器，但是因为不切实际而放弃了这个项目。与此相比，化学试剂可以储存很长时间，而且运输更方便。如果主要目标是要杀死很多人，化学试剂对恐怖分子比辐射装置更有吸引力。

但是放射性武器因为能造成心理上的冲击可能是有效的恐怖工具。许多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对辐射的恐惧与它对人体健康的危险不成比例。媒体也往往凸显恐怖分子事件，进一步增加了恐惧和惊慌。对于恐怖主义，我们感到发自内心的惧怕，总想设法完全消灭这种危险，而几乎没有注意到代价。相反，当危险的活动被看做是自愿的和熟悉的时，危险可能被低估。平均起来，每天有超过100个美国公民死于汽车事故。然而人们仍然使自己处于这种危险中，因为这是一种自愿的行为，而驾驶者有驾驭的错觉。

**问：能做些什么使核恐怖主义的危险降到最低限度？**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这是一种新的战争。我们的敌人故意把矛头指向老百姓。而不可预测性、恐惧和

破坏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武器。而我们最重要的响应是教育公众不仅了解我们面对的危险，而且要知道这种恐惧的作用。

但是公共教育只是第一步。很多政策措施可以减少这种威胁的可能性和影响。核电厂必须确保是安全的。应该做好撤离和清理预案，医院应该做好准备。在港口和边境上应该使用辐射探测器。必须改进放射性同位素跟踪系统。尽管放射性攻击的伤亡率比较低，但如果各国政府被察觉是无准备的，那么心理上的冲击将会有大得多的毁灭性。

用于全面战争的非常规武器，要求非常规的响应。必然会涉及一些新的机构和组织。商务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食品工业必须知道，在这场战争中的敌人不会穿得像士兵一样也可能不带枪。相反，在这场新的战争中的敌人可能是貌似无辜的孕妇，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你想象的恐怖分子——例如也许就是食品加工厂的内部工作人员想要偷窃放射源或污染食品。

着喋喋不休的辩论，讨论为了减少危险是否必须考虑恐怖主义的原因，或者恐怖分子意识形态的广泛吸引力。这种缺乏兴趣给我的感觉是明显的目光短浅。抑制恐怖主义的扩散将需要全球的努力。我们必须做的工作一部分是通过继续全球确保核材料和专门技术安全的努力来减少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材料，包括我前面提到的切断秘密核供应商网络。但是我们也需要研究恐怖分子意识形态是如何扩散的，以及为什么某些人似乎特别容易受到这样一种想法的影响，即针对老百姓的暴乱是对抗看上去不可阻挡的全球化 and 美国化列车的一个好方法。

恐怖主义毫无疑问是邪恶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设法了解是什么使男青年和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成为恐怖分子。如果我们只注意到恐怖主义的邪恶而不去设法了解产生恐怖主义的不满意，我们就不能制止恐怖主义。

---

**恐怖主义是一种形式的心理战，需要一种心理上认知的响应。我们的最大挑战是不做出过度反应——恐怖分子最希望的——和不要被吓倒。**

---

恐怖主义是一种形式的心理战，需要一种心理上认知的响应。我们的最大挑战是不做出过度反应——恐怖分子最希望的——和不要被吓倒。我们需要找到公民权利和公共安全之间的正确平衡。

**问：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根源和活动方面做得够不够呢？**

回答是响亮的“不够”。我的国家仍然在进行

**问：你在Ted Turner的“核威胁倡议”和帮助印度和巴基斯坦改进核武器和核材料保安方面做过一些工作，并且在你最近的书中提到俄罗斯的薄弱环节。你是如何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它们的核保安工作？**

我曾在“核威胁倡议”首创时参与帮助制订其远景规划。而接着“核威胁倡议”为斯坦福大学Scott Sagan教授和我提供资金研究是否有一种方法能帮助印

度和巴基斯坦改善核武器材料的保安工作，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事实上我们在继续帮助前苏联国家做这项工作。我一直在参加前苏联的核材料保安工作。并且，试图在巴基斯坦做这件事似乎也是个好主意。

---

## 我们必须设法了解是什么使男青年和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成为恐怖分子。

---

我去了巴基斯坦，而Scott到了印度。巴基斯坦很乐于合作，实际上尤其是希望在人员可靠性方面得到帮助。人员可靠性涉及帮助确保核材料和核武器的保管人履行职责，确保他们是可靠的，并且确保他们不会突然参加可能与巴基斯坦政府或者其他什么人作对的穆斯林组织。

当阿卜杜勒·卡迪尔·汗核网络的范围明朗化的时候，我不禁想问，我们在巴基斯坦核设施的联系人是否对这位巴基斯坦核计划前领导人与成为秘密扩散者的、有穆斯林倾向的科学家为伍有所了解——他们是否对所披露的这件事担心过。

### 问：你能告诉我们你参加《和平缔造者》这部电影的事吗？发现你的生活影响了一部电影你感到惊讶吗？

在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担任两年的分析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博士后职位后，我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的主任。事实表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人实际上从事我想干的核保安方面的工作——核材料或者核武器的可能被盗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幸运的是，关于核走私和恐怖主义的一些世界一流专家，包括物理学家Frank von Hippel和核专家Matthew Bunn，当时在政府内工作。然而也许是因为对这些威胁的重要性了解不多，也许是因为许多重要问题是高度技术性的，没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的专门技术没有得到适当的利用。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

一天，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办公室要求我会见《浮华新世界》的著名记者Leslie Cockburn。他们提醒我Leslie是一名熟练的调查人，以搜寻可能给美国白宫制造麻烦信息的能力而闻名。Leslie已经花了些时间研究俄罗斯，知道其核武器部件的保安条件很差。她关注核武器或核武器部件被恐怖分子偷窃和利用的可能性。她认为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她想知道美国白宫为保护美国人民正在做什么。

我向Leslie解释说，我像她一样关注此事，政府中许多人经常开会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向她讲述了美国政府如何执行了把大量的贮藏核武器材料空运出哈萨克斯坦的任务。那里有足够的核材料制造许多炸弹，而哈萨克斯坦政府害怕这些材料可能被盗。我告诉她我正在管理称作“核走私组织”的机构间机构，经常开会讨论报道核盗窃事件，并且制订国家政策。Leslie边听边做笔记。她似乎得到一种印象，即政府不同部门有许多人在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在采访结束后我回去工作。我很忙，也就没有更多地去想这件事。

几个月后，我接到Steven Spielberg与两个同事建立的娱乐公司“梦工厂”的电话，Cockburn和她的丈夫没有告诉我就根据我的感受撰写了一部电影，并且说服“梦工厂”去拍摄。在这部由Nicole Kidman和George Clooney主演的电影中，两个人在全世界寻找核武器。我的位置是顾问。我明白这部电影如同一种“专栏”，意欲警告世界关于核恐怖主义的危险，并且需要采取措施来对付这种威胁。然而在“9·11”之前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待恐怖主义，对这部电影的反应一般，如果在“9·11”以后上映情况肯定会更好。

---

Jessica Stern是美国关于恐怖主义的专家和《上帝名义的恐怖：为什么宗教好战分子在杀人》（2006年）一书的作者。这本书记述了她在五年内采访超过75个极端主义者组织成员的分析。她是哈佛大学公共政策讲师，曾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主任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超恐怖主义研究员。

作者把恐怖主义定义为“以实施复仇、恐吓或者以其他方式影响公众为目标对非战斗人员采取的暴力行动或者暴力威胁”。